

一、紀念世界人權宣言二十週年，端在從國際法與國內法兩方面，加強對於人權與基本自由的有效保護。聯合國體系裏的人權條約，除開多目標的「國際自由權與政治權盟約」與「國際經濟社會權與文化權盟約」而外，尚有單目標的滅絕種族罪、無國籍、奴役、強迫勞工、與種族差別待遇等等公約，均可以成爲各國接受的對象。各國在國內法上，也應力求與世界人權宣言的原則相配合。

二、任何人權條約，都不免將向來屬於所謂「國內管轄」的若干重要事項，移置於「國際關切」之下。因此，任何國家對於人權條約的批准與加入，都有極其慎重考慮的必要。歐洲人權公約的簽訂與實施，是由於其締約國具有同種族同文化的堅強基礎。它只是一項區域性的條約。聯合國主持之下的人權條約，包括上述兩種盟約在內，自始即假定爲世界性的，實缺乏類似歐洲人權公約的廣泛基礎。

三、十四年來，歐洲人權委員會與締約國之間，還不曾有過關於歐洲人權公約的正面衝突。該委員會所強調者，往往只是締約國的國內法，尚未克追及公約的條款；而並不予以譴責。其處理案件的方式，是政治的手段，遠

多於法律的程序。它毋寧上呈於歐洲會議的部長委員會，而決不輕易地推動歐洲人權法院。事實上，該委員會提出報告後三個月內，不將案件轉送法院時，該案即當然地由部長委員會作最後的決定。歐洲人權法院受理案件的爲數頗少，是不難了解的。

四、個人在歐洲人權委員會裏，取得了指控與告訴的法律地位，實爲國際法學者所最注意的新發展。由於個人的充分利用這種法律能力，若干締約國不得不修改其國內法，或付給額外的賠償。比利時作家德貝克所指訴者，竟是其所隸屬的比利時，實可視爲是國家與國民間前所未有的新關係。

（註一）聯合國國際人權會議，於本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德黑蘭召開。

（註二）若干國際法學者曾持相反之見解。國際法院與若干國內法院，亦有援引世界人權宣言，以闡述其判決理由之例證。但大多數之學者，均否認其法律上之拘束力。

（註三）歐洲會議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國際組織之一，由部長會議與諮詢大會組成。參閱拙著國際組織修訂一版第二三三頁以下，商務印書館出版。

日本左派學生走向暴力化

張棟材

一 前言

最近在自由世界所時常閃現的危險信號，乃是日、美、英、法、西德等國內都有大學生在集體鬧事，跡近製造暴亂。他們的幕後可能尚有一個隱形的總機關在指揮着，較原有的共產集團的「國際學生聯盟」更能巧妙運用青年知識份子的心理與力量。要言之，其主要的共通特徵是：每一風潮之起都與「反美」、「反越戰」有着關聯；有正式組織的左派大學生都居於公開煽動的領導

地位。對於此一情況，在上述諸國內亦均有相類似的兩種論調：其一是認爲左派大學生份子在全體大學生中僅佔極少數，滋生事端只不過是一時的不滿現實求發洩的現象，並不足爲慮。相反地，第二種意見認爲大多數一旦受極少數操縱而盲從追隨，即猶如星火燎原，便可演爲嚴重態勢，其後果堪虞。日本是以上兩種論調引起爭論最多，也同時是左派學生鬧事最繁、最激烈的一個國家。戰後日本的大學與大學生驟增，大學生總數（包括短期大學者在內）約爲一百四十萬名，左派活動份子約爲一萬四千名左右。如果只從

表面上的數字作對照，左派人數自然是極少數。可是根據自一九六〇年的「反安保」大規模運動起所現出的左派學生組織動員與迭次暴力化傾向的記錄來看，則是絕大多數受極少數的支配，其行為也不是一時的不滿現實求發洩的單純動機，而是到了危害社會安定的程度。此不但在日本國內輿論界掀動了是否應對此類學生稱之為「暴徒」「暴力學生」的對立意見；並在政府內也產生了是否應以「防止破壞活動法」施行制裁的辯論。例如左派學生組織中之一的急進派所謂「三派全學聯」，自去年十月以迄目前，一直都在積極採取向日本政府挑戰的行動，日本報紙幾無日不大事刊載此輩學生所釀成的新聞及評論，因為每項行動實已造成學生與警察的街頭交戰而至流血死傷的事件。這一派的學生叫囂着「反美」，更狂呼着「不承認資本主義體制內的一切法律」、「大學只是統治階級的工具」，完全是一幅「職業革命者」的姿態。日本政論家大宅壯一對此曾發表其觀感稱：「誠然像這派『全學聯』所表現的『戰鬥性反美派』為數不大，但不容無視與輕視的是其所能發生的潛在力量之存在。它是否能於不久的將來，在改變日本政治體制上導致爆發性的任務，那就要看今後日本的政治、經濟能否保持安定而經得起考驗。」（見本年二月四日號「每日週刊」）這一看法相當客觀精闢，道中了日本當前危機的深處。

今天日本的安定繁榮，是在受美國的安全保障下成長起來的。「日美安保條約」預定於一九七〇年滿期，「一九七〇年的危機」，是五六年來在日本國內經常被引用的一句流行語，此語足以說明日本人的警戒心情。自入本年後，又有了一個新的流行語「七〇年只剩下兩年了」，成為一般人日常交談的話題。我們可從這一個新的流行語中，觀察出日本人的各種不同的表情。這樣一句話，却因人們的立場不同而語氣相異，包含了複雜的意味。大部份的日本人，對行將滿期的「安保條約」如何續訂延長，抱着期待與憂慮，因之，在語及「只剩下兩年了」時，其語氣是感嘆而低沉。假若語氣是快捷而輕浮的，那就是喜變投機、中立傍觀與多幻想型人的代表，這種類型的人數，現正在陸續增長中。最突出而咄咄逼人的語氣，當是出諸「全學聯」型的左派大學生之口，激昂而蠻橫，這等於是磨拳擦掌的示威叫陣。事實上，這種類型的人已預訂出「七〇年鬥爭」的程序表，對這半年來的鬥爭行動亦毫不諱言地稱之為「七〇年鬥爭的前哨戰」。

日本「每日新聞」（見本年五月十四日晨刊）曾舉最近巴黎的大學生與日本大學生的暴力行動作一比較予以譏評稱：「巴黎的學生諸君遠較我們的『三派全學聯』遜色，蓋巴黎的學生諸君尚保守在障礙物之後應戰，而警察始終居於攻勢。『三派全學聯』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採守勢常是警察的一方。」又稱（見五月十五日晨刊）：「日本的『全學聯』雖然並不是值得驕傲的輸出品，但它的新聞却是輸出熱門。羽田、佐世保、成田、王子等地的騷動鏡頭，據傳正在各國的電視幕上每日放映着。」這兩小段短論，實際上恰可縮寫出今天日本的內部症狀。

二 一連串的暴力化事件

日本左派學生在這一年餘來的暴力化行動，是分別在所謂「學園鬥爭」與「政治鬥爭」上逐見激烈。「三派全學聯」一向都是担任着主要的角色，這一派大學生的作風，頗似戰前日本軍部先後發動「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的少壯軍官，人人充滿憤怒的殺氣，狂信只有集體暴力始能解決問題並能獲得滿足感，在他們的身上好像附有舊軍國主義的陰魂。實則他們的組織確已具有軍隊性格，每當示威遊行時，其裝束為戰鬥兵模樣，都頭戴鐵盔型帽，手持棍棒，只是目前尚缺槍砲武器而已。

在「學園鬥爭」中，左派學生曾於早稻田、中央、明治、法政、教育、東京等四十餘所大學內藉口反對提高學費、要求接管學生會館、進行學生與教授對談等問題，發動了下列種種暴力化行為：

一、佔領學校教室，搬出桌椅阻塞大學入口，強制罷課，妨害招生考試，阻止畢業、入學典禮，破壞學校內一切規章秩序。

二、以羣衆大會方式威脅出席校長、教授，當面辱罵，並作長時間監禁、三、左派學生組織之日共派與反日共派為爭取領導權，雙方以校內為戰鬥之戰場，形成對立敵視之恐怖氣氛。

四、與進入校內救助被監禁者或奉命維持秩序之警察衝突，以揮動棍棒、投石演而為互有負傷的混戰。

「政治鬥爭」是左派學生從學校走向街道的暴力升高，由去年十月至現在，已發生之事件如下：

一、第一羽田事件，時為去年（一九六七）十月八日，即佐藤首相由東

京羽田機場啓程訪問越南之日，各派「全學聯」大學生二千人前往機場企圖阻止，與二千四百人之警察機動隊衝突，學生焚燬了七輛警備車，並奪佔一輛消防車軋死一大學生。學生、警察雙方受傷者達七百餘人。

二、第二羽田事件，時為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即佐藤首相由羽田機場啓程訪問美國之日。這次依然是各派「全學聯」圖以實力阻止佐藤訪美而於接近機場之處與警察衝突，發生投石對催淚彈的「市街戰」。事後據東京都警視廳公佈：學生人數為五千九百名；警察動員七千人，結果有學生卅一人受傷；警察二一五人負傷。

三、佐世保事件，時為本年一月十八日即美原子潛艇勇往號駛入佐世保港之日。各派「全學聯」，包括了社會黨系與日共系者在內，均陸續自各地趕至佐世保舉行反美示威活動。在佐世保以外如東京、京都、博多等地即曾接連發生學生與警察之亂鬥，佐世保重演學、警「市街戰」的結果，有學生卅六人，警察百餘人重輕傷，被稱為繼羽田之後的第三次流血事件。

四、成田事件，即為反對以千葉縣成田市郊區為建造新東京國際機場的流血事件，自本年二月廿六日由「三派全學聯」在成田召開示威大會與警察衝突造成學生六十一人、警察三六六人重輕傷的第四次流血事件起，即呈波浪式的學警對峙戰，「全學聯」與「反戰青年委員會」又繼於三月十日在成田召開「粉碎三里塚機場、反對侵略越南大會」舉行示威遊行，與警察混戰為市街屋頂的追逐戰，雙方負傷者達五百四十餘名。

五、王子事件，即為反對美軍在東京都北區王子設立後方陸軍醫院，自三月初旬以至四月中旬，各派「全學聯」屢次發動示威遊行，均與警察釀成「市街游擊戰」，每次雙方亦均有重大之負傷，其最烈者為三月八日、三月廿八日、四月一日、四月十五日等次，學生方面以成型化的軍團組織襲擊警察派出所，突入美軍基地。

日本輿論界對以上諸事件曾稱之為以左派學生為中心的反美勢力之「七〇年鬥爭的預行演習」，預料此後將陸續出現更趨激動的騷動。日本政府當局對未來兩年後續訂安保條約所必引起的紛爭以至擴大為動亂的對策，也正作戒慎恐懼的檢討。蓋左派學生結羣走出學校的「政治鬥爭」，其暴力化傾向殆已勢難轉換，恰如「三派全學聯」領導者們所公然聲明的：「國家權力即係暴力，故須以暴力對抗暴力。」

三 暴力集團——「全學聯」的內幕

所謂「全學聯」，乃是「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的簡稱名稱，曾因一九六〇年參與反日美安保新約的大規模反美運動而達成迫使當時美總統艾森豪威爾取消訪日之行；岸內閣亦受影響而下台的效果，遂立即聞名於全世界，「ZENGA KUREN」也成了一個為人所熟知的專名詞。歐美報刊會一再介紹，更使它風頭十足。

「全學聯」最初即係受日本共產黨指導而成立的，最盛時（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擁有一百二十餘所大學約二百五十餘個自治會，在其組織支配下的學生人數約達二十九萬餘名。一九六〇年後，內部發生分裂，以互相爭奪領導權而均無統一全局之力，便一時形成各自割據稱雄的「五系十三派」錯雜現象：（括弧內為簡稱）

（一）日本共產黨（日共）系——日本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同）

革共同全國委員會——日本馬克斯主義學生同盟
革命的馬克斯主義——革命的馬克斯主義派
派——（馬學同革馬派）
革共同全國委員會——日本馬克斯主義學生同盟
中派核——（馬學同中核派）

（二）日本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革共同）系
第四國際——國際主義共產青年同盟
日本支部——（青年國際）
（舊關西派）——托洛斯基主義者學生同盟
（托學同）
馬克斯主義者——（四月同盟）

（三）共產主義者同盟——日本社會主義學生同盟
（共同）系——（社學同）——全國委員會派（統一派）
ML同盟派

（四）日本社會黨系——日本社會主義青年同盟——解放派
（社青同）——社會主義協會派
統一社會主義同盟——社會主義學生戰線
（FRONT）
共產主義勞動者黨——共產主義青年同盟
（共青同）
日本共產黨（日本之聲）——民主主義學生同盟
（民學同）

（五）構造改革系——日本共產黨（日本之聲）——民主主義學生同盟
（民學同）

上述各系均各以「全學聯」的正統自命，要以「日共」系所把持者

為最強。①項「革共同」系，屬托洛斯基主義。②項為脫離日共之學生，自稱「新左翼」。③項為脫離日共之親俄派產物，以意大利共黨已故首領陶里亞蒂之構造改革即在民主的憲法下可由資本主義構造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構造之理論為依據。不過，這些林立的派系在實質上都是共產黨的細胞組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屬於上述②項中的「馬學同中核派」；③項中的「社學同」；④項中的「社青同解放派」等三派團結聯合召開了「全學聯再建大會」，當時計有全國三十五所大學、七十一個自治會加盟，聲勢頗為新銳積極。日共嫉視此一勁敵，將其稱之為「偽組織」；而這三派「全學聯」則竭力強調其自身為真正之正統。從此，日本報刊有關「全學聯」活動的報道，為了要區分其何屬及其性格辨別起見，便冠以「日共系全學聯」、「三派全學聯」或「反日共、反近代木系全學聯」等字樣。

「三派全學聯」自負為具有「革命的戰鬥性」的反美全學聯之真正繼承者，它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成立時便通過了以「阻止一九七〇年重訂安保條約」為基本的運動方針，聲稱：「學生運動為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先驅部隊，擔任革命的一翼」、「我全學聯的最大鬥爭課題為阻止一九七〇年重訂安保條約的決戰。」他們提倡「學園鬥爭與政治鬥爭相結合」、「市街戰與陣地戰相結合」的戰術，在各大學內所發生的學生對校長、教授的暴力化威脅恫嚇行為以及自去年十月起所接連發生的羽田—佐世保—成田—王子等學、警衝突流血事件，幾乎全是這「三派全學聯」份子所導演而起的。這確乎有所謂「一九七〇年鬥爭」的「前哨戰」、「預行演習」景象。

在反日共的「三派全學聯」之外，尚有「革馬派全學聯」，與「日共系全學聯」對壘，但就勢力分佈來講：前二者相加，亦僅及日共系者之半。而前二者雖持同一的反日共立場，却又相互敵對並見之於暴力的打鬥，削弱了反日共的實力。

三大派系的全學聯勢力，滲入日本全國的大學之內：日共系者以國立大學為活動中心，掌握着全國公立大學學生自治會約百分之七十以上；「三派」及「革馬派」兩全學聯的活動根據地則是私立大學。每年春季新學期開始時，新生就是他們大力爭取的對象，特別是急進的「三派全學聯」活動，更為露骨，似乎也最能刺激新生的好奇、與熱情。所以，每次鬧事與警察混戰

時，那些最有「不畏一切氣概」的打前鋒的大學生，也是以一年級新生為最多數。

三大派系的以及聊備一格的「構造改造系」的「全學聯」，有一個共同一致的總目標，那就是「反美」「阻止重訂安保條約的一九七〇年鬥爭」。至於他們的爭論之點，亦只是對暴力化行動在方法、時期上的輕重緩急之分歧，若就這兩派是否可能合流論：這並不是多麼難以協調的問題，真正的難題實為領導權的爭奪戰在短期內不易解決。

四 右派學生組織的抬頭

共產黨各派「全學聯」的勢力擴張，使日本各大學內被動地逐漸出現右派學生的結合，向左派學生應戰。這一對抗力量之成長，並非起於偶然的反應，而且淵源於既有的土壤基礎：

第一：右派社團近年來有顯著的增強，據日本治安當局公佈稱，現全國有四百個右派社團，總人數達十一萬人，其勢力亦已伸及大學領域，看中了以大學生為其新血的力源，故多在大學內着手分支組織部署。

第二：各國、私立大學在戰前即有屬於右派社團系統的學生組織，如東京帝大之「日之會」、京都帝大之「摺與學會」、早大之「軍事研究團」「潮之會」、中大之「殉國青年隊」等，皆為當時最活躍者。其根既存，便易於應運而生。

今天日本右派社團所號召者為喚起民族主義的良識，重建愛國精神。其於去（一九六七）年的重要活動，計有：「勸告東京都知事美濃部辭職」、「為北方領土問題向蘇俄大使館提抗議」、「應即停止日、匪貿易」、「針對七〇年危機加強防衛力」、「宣佈共產黨非法化」、「推行反共外交」、「整備治安關係法規」等要求提出與呼籲。在「三派全學聯」鼓動羽田以至王子流血事件之後，此類右派社團更大聲疾呼：「赤色革命已迫近目前」、「以實力對抗暴力」，認真地排出發動員計劃。綜觀各大學內響應右派社團或最低限度在精神上與其有共鳴感的右派學生組織，實大有雨後春筍般的盛茂之狀，例如：

一、早大、東大、一橋大、國士館大、日大等校右派學生聯合成立「日

本學生同盟」。在其指導下，早大等校更紛紛成立「國防部」，與左派學生對抗。

二、東大之「土曜會」；早大之「日本文化研究會」；「自由思想研究會」；「光明思想研究會」；「一橋大之「現代日本研究會」等皆係右派學生之小型團體，互保同盟兄弟關係。

三、青山學院學生組有「學生國防協會」；中大、理大、明大、拓大等校有「學生運動聯絡協議會」之共同組織。

四、阪大、關大、神大、滋大等校學生共組「新日本學生同盟」，近畿大組有「祖國防衛學生隊」。

此外，尚有較堪注目的特殊組織情況如：

①「大日本生產黨」聲稱聯合了東京都私立大學十校成立有「新民族主義學生研究會」，作為該黨的友誼團體。

②戰前為右派社團首領之一的兒玉譽士夫，為培養右派領導人材，設立「日本青年講座」，通過各大學右派學生團體吸收大學生受訓。

③宗教團體如「創價學會」「生長之家」「立正佼成會」之學生部以及基督教統一教會，原理教會均在大學內展開工作。

照目前日本大學內的右派學生組織及其行動表現看，才只是剛剛抬頭的開始，它的組織尚屬零星散漫，故抵制左派學生活動的作用，仍處於微弱階段。不過，他們都已揭出了鮮明的反共旗幟，此點大可促成其集中力量以謀發展的趨向。但由於右派學生組織和右派社團有着形影相隨的關聯，也可能成為一種發展的阻力，因為在一般日本人的心目中，對戰前右派社團為侵略的軍國主義幫兇的法西斯作風，至今記憶猶存；且於戰後這些社團的組成份子良莠不齊，亦多有與市井的「暴力團」狼狽為惡，信譽掃地。大學內的右派學生要想獲取社會大眾的支持，還需要很多的立信努力。

五 結語

左派學生以「全學聯」羣衆組織一再製造出的校內、校外暴力化行動，現已引起日本教育當局和治安當局的深甚憂慮，社會輿論亦普遍地對左派學生及教育、治安負責者作痛切批判。

日本左派學生走向暴力化

日本政府曾邀集「國立大學協會」、「私立大學聯盟」的各大學校長懇談對策，這些最高學府的主持人有一共同的反省：他們承認今天的學生假自治運動之名不只是限於干涉校務範圍，而是和推翻現社會制度的某種野心計劃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過去對此點欠缺認識，放縱了學生。因之，在對策方面，商定了下列諸點：

①將少數的左派活動份子和一般的守份學生劃清界限，分別看待。對少數人越軌行為之取締，不視為對思想學術自由之侵犯。

②大學本身不能單獨解決處理「職業革命學生」問題，須與政府、社會、大眾傳播機關等協力合作。

③戰後教育制度未臻完善，應作長遠打算之檢討，使大學為學生熱愛於大學生活之學府。

④大學並非治外法權的場所，警察亦可進入學校，惟須取得大學負責當局之同意。

在社會輿論方面，指出學生之暴徒化原因，是戰後商業化大學之大量增加，幾均以牟利為目的，教育失去既有之精神而形為自小學、中學以至大學的無責任制之連續，更為了要模倣美式民主而誤陷於自私的個人主義，無視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社會上對以「前進」自命的教師尤多責備，認為他們從旁煽惑，一味迎合學生的惡趣味，已早失去為人師表的資格。「日教組」這一個教師組織不能辭其咎。

日本政府曾經考慮過對左派學生組織鬧事的鎮壓方式，要適用「防止破壞活動法」如第五條得令其於六個月期間停止集會遊行並停止發行機關報；第七條得令其團體組織解散。但經過慎重檢討之後，則決定改為適用刑法第一百零六條的騷亂罪，照此條規定即：凡集合衆人施行暴舉或脅迫者，即屬騷亂罪，對其處罰為①首魁處十年以下徒刑；②指揮他人或率先助勢者處六個月以上七年以下之徒刑；③隨行附和者處二千五百圓之罰金。

日本政府的該項決定與以前所考慮的適用「防止破壞活動法」，其最大的不同之點乃是前者能從根本上消除對象；後者僅為溫和的取締對象。可以窺見其對學生仍採取寬容的看待態度。這種態度和今天日本對共產黨的姑息主義，原是出於一體的。